

王其禕 周曉薇

編著

隋代墓志銘彙考

綫裝書局

隋代墓志銘彙考

1

編著 王其禕 周曉薇
助理 樊波 王慶衛
顧問 毛漢光 耿慧玲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綫裝書局

序 一

黃永年

近時治國史者多習於斷代，斷代則多言隋唐，言隋唐實多略隋詳唐，以唐之天可汗自豪，而隋享年短促若不足道者，其實非也。以東漢季年宇內分崩，至曹魏司馬晉之滅蜀吳，爲時已八十餘年，旋有八王五胡之亂，又經東晉南北朝歷時二百七十餘年始有楊隋之統一。而通典食貨記歷代盛衰戶口，謂「大業五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極盛」，而入唐後「貞觀戶不滿三百萬」，經營百餘年至天寶「十四載管戶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管口總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始及隋盛時，則楊隋之所以盛及其所以能統一，治史者豈不宜熟慮深思也？永年昔治北朝齊周史事，推測彼時實以山東魏齊之經濟文化，與關隴武力相結合之所致。惜傳世隋書之撰修，雖出身歷其時之魏徵諸人，然或緣時忌，未能備詳其時之所以美善，李延壽撰北史亦無多增益。欲明其究竟，甚盼新史料之發現，此地下埋藏之墓誌碑刻之所以見重於世，而隋石尤爲昔人稱道，固不特以楷法見珍而已。

王其禕、周曉薇伉儷嘗從永年研治國史，今就出土傳世之楊隋墓誌逐一錄文研討，成此隋代墓誌銘彙考六卷，備盡辛勞，時獲勝義。竊以謂大有助於我國中古史事之考說，實亦爲通曉我國中古史事作出新貢獻。因謹書數語，以慶此彙考之問世。

序 二

——隋代的墓誌銘與其歷史的定位

耿慧玲 毛漢光

隋代墓誌銘彙考是西安碑林博物館所執行的研究計劃，二〇〇一年開始由國家文物局資助，列入全國文物博物館系統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課題，二〇〇二年開始進行編纂，二〇〇三年『隋代墓誌銘彙考計劃』主持人王其禕研究員和周曉薇教授邀請毛漢光教授與本人參與墓誌的編纂計劃，預計將當時所蒐集五百餘種隋代墓誌標點並集釋出版。毛師遂與本人進行計劃應如何推行之設計，認為需要先就隋代與隋代金石做初步之定位，方能將隋代墓誌在歷史上的特殊地位標誌出來，也方能將隋代墓誌銘的歷史功能盡可能地彰顯出來。

隋代是中國一個短暫的統一王朝，這樣的王朝其存在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他所面臨的是一個絕對的變局——結束了前一個時代的混亂與分立，卻又旋及為另一個王朝所取代。與隋代差相比擬的就是秦代，它們都結束了一個長期分立的時代，且這個長期分立的時代，均已發展成爲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形態。秦之前的戰國時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每一個邦國都有其獨特的價值標準、思想形態、生活方式、文字系統，要結束這樣多元的時代，本身就是一個極大的成就。秦完成了軍事與政治上的統一，但顯然並未能真正解決政治與軍事統一後的統合任務，六國後裔及其民眾最後結

束了秦的政權，不過，秦的功業並不在自己本身政權的存續，而是給了後起的漢一份深厚的遺產，秦所遂行的一些新的制度，成爲漢帝國之所以能夠偉大的重要條件。隋的情況亦復如此。魏晉南北朝所面臨的多元化，較之戰國時期絕不遜讓，民族的衝突、階級的衝突、宗教信仰的衝突、文化的衝突、地域的衝突、貧富的衝突，凡是人群所面臨的幾個重要的『矛盾』與衝突，都在魏晉南北朝出現，隋之能夠結束魏晉南北朝分立的局勢，主要在於承襲北周原有的勢力。錢賓四先生曾經分析隋代經濟上的成功，謂府庫之所以充實者其因爲：一、統一戰爭的耗費較少；二、吏治清明；三、中央政令統一；四、社會階級之消融。而上述四個條件均與周隋之改朝換代並未消耗太多社會的資源，幾乎完全承襲北周的財產有關。因此，隋代在對陳的戰爭不需花費太多的經費的狀況下，可以平順地完成大一統的功業。但是，隋所需要面對的是南北文化融合的問題。

魏晉南北朝的分裂與北方民族的南下有密切之關聯性，北方自晉室南渡之後便陷入所謂的五胡十六國的紛亂狀態中，就其中北中國的漢族與匈奴、鮮卑、羯、氐、羌諸族在歷史的長河中相互涵化；而南渡的漢人則與長江流域一帶的百越族融合。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政治選擇，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在四百年的演變發展中，南北之間經過不斷的衝擊，再融合，再分化，至南北朝末期，南北文化已經形成相當大的差異，加上兩邊不同的政治結構所形成的不同核心集團，隋文帝雖以軍事征服了南方政權，但如何調和這兩股不同的文化與勢力，卻與秦對付六國遺緒是一樣困難的工作。煬帝在南北文化融合上，下了極大的功夫，其本身就對於南方甚爲着迷，在其任晉王之時，所收錄的王府學士，便是以南方人士爲骨幹，但這樣當然也讓原有的核心集團產生不滿，南北勢力的衝突，使得煬帝丟掉了性命，但這種努力卻也讓後來的唐朝有憑藉，起碼不是站在零點或負數上，

去進行南北之融合。因此，煬帝的失敗其實具有歷史的悲劇色彩^①。正如同秦代在歷史上的角色一般，隋代所帶給後世最大的貢獻，便是成就了一個輝煌的唐朝。作爲一個傳遞歷史的金石載體，隋代的金石究竟可以反映出怎樣的社會面貌，是一個值得探討的事情。

金石基本上具有一些其他載體所同時具有的特色，其一、流傳久遠；其二、具有昭示性；其三、與當時社會的主流文化有關。

流傳久遠是金石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其目的就是『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②，這種傳遺後世的觀念，使得金石本來就成爲傳述歷史的一部分。此外，金石記載必具有昭示性，不管是昭示於普世大眾、後世子孫，還是冥界鬼神，因此，金石的刊刻基本上反映出刊刻者的社會與經濟地位，即無論青銅所代表的稀金屬經濟價值，以石刻而言，要找到一塊可以刊刻的美石，巨大到可以記載煌煌數千言，雕龍琢鳳立於天地之間而不毀損，亦絕非易事，端看今日出土的碑、誌，可知貴爲王室子孫，其誌石亦不全然是完美的，尚有一些墓誌、碑石在刻刊的時候，是將已使用過的磨去再刻，即亦因爲好石難求，因此，經濟的能力是石刻刊刻樹立的第一要件；而堂皇的昭示性，若沒有相當的社會地位，在古代的集權與階級社會中，也是不可能出現的。由是可知，歷史中金石記載的內容自然與社會的主流階層及主流觀念有關。那麼在隋代墓誌的整理中，應該要強調什麼樣的研究內容呢？又應該用怎樣的方

^① 南北之間的分化與融合都是在時間縱度上的發展，在南北朝的時候，南北雖然分立，但長期的戰爭與外交關係都使得南北文化有融合的孔道，反倒是隋文帝執政之後，以北方政權統一了南方政權，代表戰勝者——關隴集團的隋文帝對於南方文化的包容力刻意地降低了，隋初反成爲南北融合倒退的一個時代，但融合的趨勢是依舊存在的，楊廣對於南方文化的接受就是融合的一項具體成果，但是對於南方文化的支持，勢必將一些權力分給南方的菁英集團，這對於北方政權的核心集團的權力自然就產生了影響，煬帝的失敗正由於如此。

^② 墨子卷四兼愛下第十六，孫詒讓墨子閒詁一二〇頁，中華書局二〇〇一年。

式來呈現呢？

墓誌的功能在「記人」^①，其發展綜合了官印、告地狀、銘旌、柩銘以及碑的記載性質，因此，墓誌內容大致包括了對於墓誌主家世（三代與先祖）、婚姻的狀況（配偶及其家屬的記載）、身份（出身）、地位（官職）、經歷（生平事蹟）及宗教信仰（思想、精神生活）等記載。從目前出土的墓誌來看，墓誌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皇室墓誌逐漸擴散到大士族墓誌，到了唐代，更逐漸擴散到中下層官吏亦有墓誌，在這個歷史進程中，隋正是處於「承先啟後」的關鍵時刻。在整理研究的過程中，新出的隋墓誌不斷出現，其數量已經快速增加到五百餘種，然而令狐德棻等人所修撰的隋書列傳僅收錄三六二人，也就是說即算只有五百餘種的墓誌也幾乎是隋書列傳的兩倍，其中絕大部分與隋書列傳並不重複，這樣的資料數量若說是在編纂另一部隋代的人物誌，其實也並不為過，因此，我們覺得隋代墓誌的研究，應該要站在制高點上，不僅僅只是正史的補充資料，更應該強調在作為史學研究中與正史的對等地位。因此我們建議以編入「誌」的方式作為處理資料的基本原則，使之與正史的「傳」同樣受到重視。

至於墓誌整理的方式有許多種，有錄全文，也有錄圖版者，也有錄全文亦錄圖版者。錄全文也有加標點斷句者，也有加標點斷句亦加註釋者，也有加標點斷句再加題跋者，也有加標點斷句亦加註釋、題跋再加考釋者。錄圖版有註明墓誌形制、出土地點、收藏地點者，也有說明以上資料後再加以敘述墓誌主生平者，也有再加以歷史考證者。凡此種種，均有其不同之研究功能，但也有其一定之困難與侷限。目前對於中國墓誌的研究，主要都在唐代，一是因為唐代墓誌銘的數量非常龐大，數量大到可以依循墓誌銘總結一些歷史的規律；二是因為唐代本身燦爛而多元的政治與文化，有絕大的研究範疇可以縱橫浸淫，進行各方面的研究。本序作者曾經處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唐代墓誌銘，出版唐代墓

① 將石刻記載依據內容分類，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記人」，一種「記事」，墓誌的記載內容以墓誌主為主，是記人資料的典型。

誌銘彙編附考，也曾赴柏克萊加州大學整理東亞圖書館拓片資料，又曾進行越南漢喃研究院所藏漢文拓片的整理與研究，近三年對於台灣碑誌開始進行導讀研究。每一個不同的計劃，根據不同的資料狀態與出版需求去做設計，每一個出版方式也都依據不同的內容改變不同的形式，但均有一個共同的原則，就是希望『存真』與『創新』並存，同時努力地將該資料的特色表現出來。例如越南漢文金石的內容十分復雜，雖然表面看來是漢文，但是卻是記載越南的歷史、文化；雖然記載越南的歷史與文化，卻常用中國儒家的觀念與傳統的駢文與典故；雖然同是孤立語系統卻有不一樣的語序；因此，在編纂越南漢喃銘文匯編時，註釋的要求是最重要的一個項目，所幸越南漢喃銘文在李陳朝以前數量不多，因而，出版時註釋的數量成爲書籍的特色。而柏克萊東亞圖書館的拓片，則主要在編目整理，故而以電腦資料檢索的建立及圖版的上網，成爲呈現的重心。在處理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的出版時，因爲唐代墓誌銘有數量大^①、字數多^②、誌主主要是中下階層的士族^③這幾個重要的特色，因此，在整理與設計時，主要以碑誌主在正史中是否有傳，是否另有神道碑，其世系建構，其事蹟之考證，歷世時期的記載，婚姻關係如何，作爲編纂立意的主要項目。而以墓誌的楷體化、收集石刻書籍中之考釋與跋尾，以及墓誌銘中人名、官爵與地名典故註釋作爲集釋的方式，希望藉由大數量的士族人物誌提供唐代社會史及政治、文化研究相當重要的一手資料。

隋代墓誌在數量上雖然較少，但在『人物』誌與『承先啟後』的基礎上，更能建立隋代墓誌銘的特色。例如，五百餘種的墓誌，正可以作爲中古時期碑體字的集結與研究；又如因隋代歷史的短暫，許多

① 傅斯年圖書館所收唐代墓誌銘凡三千餘件，若加上其他公私機構所有拓片，及文獻資料中所蒐得的拓片，總數約五千二百種，而新舊唐書記傳約二千六百人，其中墓誌銘與記傳皆有者僅佔百分之五，可見唐墓誌可補充新舊唐書未載人物比例甚高。

② 墓誌每篇字數平均三百至五百字，若以上數墓誌篇數統計，唐代墓誌銘可以有百萬字數，對於唐代文學應有相當程度的補充。

③ 在新舊唐書中有記傳者僅佔百分之五，亦即唐墓誌可以提供唐代社會史及政治、文化研究相當重要的一手資料。

誌主都經歷多朝，由誌主的生平歷世的記載，必然可以對於隋代前後政權與社會的推移有重要的補正；又如，隋代正處於南北融合之際，文章體例又尚未固定，墓誌文正可作為文學與文學史研究的重要文獻；又如隋代正處於多民族時代，不同族屬的墓誌主生平記載當可反映當時的民族、社會狀態。凡此種種，皆為隋代墓誌較唐代墓誌更為突出的價值。同時，隋代墓誌多為近代出土者，出土資料完整，更可將墓誌本身內外的狀況做系統性的研究。經與主持人王其禕研究員與周曉薇教授的討論，隋代墓誌銘彙考的編輯也將以上的內容化整為九個項目即：一、卒葬時間。二、行款書體。三、撰書人名。四、誌文標題。五、誌蓋標題。六、形制紋飾。七、出土時地。八、存佚狀況。九、主要著錄。希望能在歷史史實研究與補充上，更能注意到藝術、考古、書法、宗教等研究範疇。

此外需要處理的編輯問題有四：一、伴隨着考古不斷出現的新資料如何解決；二、生於隋前而死於隋後，和生於隋而死於唐的資料如何安排；三、有目而無誌的資料如何處理；四、已經由前人處理過的高昌磚誌如何歸屬。這些問題在隋代墓誌銘彙考也做了適切的考量規劃。

從二〇〇二年迄今已經五個寒暑，其中有三個暑假是在西安碑林度過，每次總經過七八次的討論，每一次討論的時間都超過三個小時，我們的目標是希望在同類書的優點基礎上，盡量地超越，尤其是超越我們的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當然，就以隋代金石研究成果而論，隋代墓誌銘彙考的雛形已經具有創新的地位。如今隋代墓誌銘彙考即將交付出版，心中感慨萬千，回首三年，才發現竟連仔細地參觀一次西安碑林都不曾有過，這一次的合作可以說是成功而完美的，可以作為不同背景合作的範例，希望這樣的學術研究能夠繼續。如今，為我曾經的付出覺得驕傲，也為其禕、曉薇伉儷及其他夥伴們賀。

二〇〇六年十月十五日

導言

從知華屋卽山邱，桂翠蘭香影不留，畢竟古人能好事，摩挲片石已千秋。

——清·陳彝題隋張通妻陶貴墓誌

隋代墓誌銘彙考（以下簡稱彙考）是國家文物局立項資助並由西安碑林博物館組織實施的科研項目，列入二〇〇一年全國文物博物館系統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課題，課題編號爲2001012。自二〇〇二年夏季啓行編纂，迄二〇〇六年秋天始克蒞事。日月往復，經年再三，此間付出的心力、承受的甘苦和得到的襄幫，已然凝聚成這部多冊本的著作，奉獻給傳承文明走向進步的社會，而其庶能小助於學術並得留證於時代，則又無任欣慰之至。

一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彙考的動機正是從責任出發，在感知歷史的同時而能服務於歷史，在受惠於學術的同時也能略助於學術。於是彙考納入了方興未艾的對出土文獻整理與研究的範疇，並定位於對一個斷代——隋代墓誌銘文的整合彙編的性質。而此方範疇並此種性質又決定了彙考的旨趣所

在，即悉數統合並系統化編理迄今所能見知之隋代墓誌銘的原始文字與拓本資料以及相關信息，更附以前人考跋之主要和編者校勘之雜識，以期為隋代歷史研究的進步援以推力。

感知學術的歷史，乃知是歷史的學術。正所謂一時代有一時代的精神，遂決定了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學術，而學術的精神與其成就又需根植在一時代新資料的發現與新方法的探索的基礎之上。試看近世史學之革命，隨著西學東漸和自然科學對人文科學在方法論上的影響，以王國維先生『二重證據』為旗幟的史學研究法，直接導引了近代史學的進步，開創了考古與歷史相結合的新的史學門徑。百年以來，當大量湧現的地下實物資料與傳世歷史文獻互為印證，於是史學研究的領域拓展了，材料豐富了，信據充分了，理論也隨之出新了。緣此，史學工作者愈加強調歷史研究最重資料，且尤為重視尋覓史書以外因散在四方而求之不易的第一手資料。衆所周知，鐫金刊石的刻辭文字，無疑是史學的重要寶藏，比起紙張簡帛更能經歷久遠而不易朽壞，更能保存本真而難以磨改。是故，『一般而論，金石文字的數量不能與紙帛文字相比。以少量補充於多量，以原始性較高的金石文考證傳鈔翻印的書籍，乃是學界求全求真的治學辦法』^①。而掩於地下的『葬幽之文』——石刻墓銘，又乃石刻文獻中之大端，一經出土，其所保留的原始信息，尤見真實而珍貴，可以還正史事甚或補闕匡謬者良多，故其價值誠不下於甲骨卜辭之於殷商、鼎彝銘文之於周代以及流沙墜簡之於漢朝。這也是近世以來東西學人慨唱『史書不足以盡史』，必藉出土文獻以為印證方覺信而有徵的緣由所在。

『據史傳以考遺刻，復以遺刻還正史傳』的史學考據方法肇始於宋代，以歐陽修集古錄和趙明誠金石錄為標誌，從此奠定了金石之學這一專門學問的基礎。清代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與近代以碑證史實踐的復興，在著錄和考訂的本質上，皆是對宋人成法的繼承與發揚。的確，石刻有裨於文獻者，良非淺

① 毛漢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總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一，一九八三年版第一頁。

鮮。乾嘉通儒錢大昕曾說過：

金石之學，與經史相表裏。……歐趙洪諸家，涉獵正史，是正尤多。蓋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壞，手鈔板刻，輾轉失真，獨金石銘勒，出於千百載以前，猶見古人真面目，其人其事，信而有徵，故可寶也。^①

宜祿堂收藏金石記撰者朱士端又嘗總結道：

金石之功大矣哉。可以考經籍史傳，可以溯古籀篆隸，可知徵詁訓聲音，可以通文字假借，可以識冠服器用，可以推年月支干，可以訪山川地輿，可以補官爵姓氏，可以稽禮儀兵制，可以弔忠孝隱逸，可以鑒禍亂權奸，可以存遺編剩稿，可以博佛書釋典。……^②

晚清葉昌熾語石卷六『碑版有資考訂』一條更詳爲舉要：

撰書題額結銜可以考官爵，碑陰姓氏亦往往書官於上。斗筲之祿，史或不言，則更可以之補闕。郡邑省併，陵谷遷改，參互考求，瞭於目驗。關中碑誌凡書生卒，必云終於某縣某坊某里之私第，或云葬於某縣某邨某里之原，以證雍錄、長安志無不脗合。推之他處，其有資於邑乘者多矣。至於訂史，唐碑之族望及子孫名位可補宗室、宰相世系表；建碑之年月可補朔閏表；生卒之年月可補疑年錄；北朝造象寺記可補魏書釋老志；天璽紀功、天發神讖之類可補符瑞志；投龍、齋醮、五嶽登封可補郊祀志；漢之孔廟諸碑，魏之受禪、尊號，宋之道君五禮，可補禮志；唐之令長新誠，宋之慎刑箴、戒石

① 關中金石記敘，清乾隆六年經訓堂刻本。

② 宜祿堂收藏金石記六卷本『敘』，清同治二年春雨樓叢書刊本。

銘，可補刑法志。古人詩集，凡有登覽紀遊之作，注家皆可以題名考之。郡邑流寓，亦可據為實錄。舉一反三，餉遺靡盡。^①

由是信知碑版資料助益於史學研究之功大莫甚焉。

二

那麼，該如何認識隋代墓誌銘的史料價值與隋代研究的關係？誠然欲研治歷史，先須探尋與開拓史源，這是極其重要的。正所謂：「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們所研究的材料便是進步，不能的便是退步。」^②而「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③就隋代而言，以其國祚之短暫，著述本不多，因而最惜史源之有限，傳世文獻則大抵除正史中的隋書而外可資利用的第一手資料多不復能見，這是局限隋代研究的一大因素。為此彙考所做的對隋代墓誌銘資料的全面統合，就當以補備乃至同等於隋書基本價值的高標來營作之，且這種未經史官選擇與改削的原始資料排除掉其中的諛墓成分，又當較正史更能存真存實並儼然構成一部原始的隋代人物誌，而為治史者所樂於取徵以預於時代學術之新潮流。

黃永年師嘗就歷史研究的斷代與通貫之關係指出：

① 新世紀萬有文庫王其禕校點本，遼寧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一七〇頁。

②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四頁。

③ 陳寅恪陳垣燉煌劫餘錄序，載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第二三六頁。

但歷史的進展又確如流水無從割斷的。說研究這一斷代、這個朝代，只是大體說研究重點是在此而不在彼，並非真從此朝代建立之日研究起，到其傾覆之時即截然而止。因為其所以能建立此新朝，事先必早有憑藉，而其傾覆的因子亦必早已種下。^①

這也就是說分期斷代只是爲了研究方便，在研究時往往要用到前面和後面的史料。以此道理來認知對隋代墓誌銘史料的研究與利用自更應如此。試就隋代歷史的定位看：楊隋有國不過二世，開皇、仁壽迄於大業，僅歷三十八年。但這三十八年卻是結束了南北朝近三百年分裂混亂而重歸一統的時代，是民族的融合與文化的華化已然達於實現的時代，也是勵精圖治並在政治與經濟的統合上遺惠深遠的時代。似這樣一個時代，國運雖短而其承前啓後之作用卻是非常之大，從疆域的統一，到政治與經濟的整合，其在民族人群的融并、中央體制的架構、典章制度的完善、經濟中心的規模、基本建設的告成等諸方面，都帶給後來臻於封建時代巔峰的李唐王朝以豐富實惠的遺產和一脈相承的影響。可知有如漢承秦制的定位，對唐代（尤其初唐史事）的研究同樣有待於對隋代研究的深化而得以深化。譬如『李唐傳世將三百年，而楊隋享國爲日至短，兩朝之典章制度傳授因襲幾無不同，故可視爲一體』。^②又譬如『唐初將相大臣中有許多是隋代貴族的子弟，他們父兄的傳見於隋書，還有很多在隋書裏列傳的人物實際生活到唐初，研究初唐史事往往需要參考隋書裏這些人物的傳』。^③而比較於史傳，詳記人物的墓誌銘文，自更能真切勾勒出相關人物的生平起浮與其家世興衰，並可藉以透見政治經濟的局面和社會生活的形態。統計彙考所蒐六百餘位人物誌，其中僅十五

① 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導言，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第二頁。

②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敘論，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一頁。

③ 黃永年唐史史料學紀傳類隋書，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第三五頁。

人在隋書有傳，比數約占隋書立傳者三六五人的二十四分之一，那麼，從保存人物史事的第一手材料得以倍加擴大的意義而論，更得證見隋代墓誌銘的研究地位之重要和資料價值之可貴。再何況以隋代僅三十八年之短祚，往往所見墓誌主人的主要生活與仕宦經歷乃在前面南朝的梁、陳和北朝的北魏、西魏、東魏、北齊、北周等朝代，如王士良、呂思禮、尉遲運、裴鴻四位誌主均在周書中有傳，又如周書中有傳的賀蘭祥、北齊書中有傳的封子繪和封孝琰，他們妻子的墓誌皆收在彙考中，自然這樣一些誌文又對前朝史事的研究具有著與正史同等重要的史料價值。

彙考所統合的資料就其大端來分有史料的價值和書法的價值兩大方面，而尤以史料的價值最為豐富廣泛，亦必最為研究者所關注。譬如以之作社會基礎與成分的量化統計分析，則當能為前輩學者步步推進的『關中本位政策』所鳩合之關隴集團『入隋後開始解體』的新理論^①提供更充分的依據。以之作軍府資料的統合，則可以規模出隋代鷹揚府的分佈態勢、軍事格局與府兵性質。以之作長安、洛陽的地名梳理考訂，則可以補備隋代兩京城坊和城郊地區歷史地理研究之不足。以之作家族郡望世系及歷官婚姻的透視，則可以探討士族與政治經濟乃至社會文化之關係。以之作與隋書十志的比勘，則可以更多印證和充實諸如禮儀、音樂、律曆、食貨、刑法、百官、地理、經籍等典章制度的沿革。至于書法的價值，則因為隋代的楷書乃是對南北朝過渡書體的終結，從而以其模範作用促使楷法帶著瘦硬通神的風采從間架到筆法在初唐步入完善。其次是字樣的趨為規範，很大程度影響了唐代以干祿字書和九經字樣為代表的官方書寫標準。又其銘文之用韻還可以比較從南北朝語音融合（如劉宋李槩音譜、北齊陽休之韻略、隋陸法言切韻）到唐音（如孫愐唐韻）廣為普及之間中古漢語語音聲律的變化。而從墓誌銘文學與書法的評鑑中也能夠窺見隋代一般士人的總體文化素質和精神面貌。當然還有墓誌形制（碑

① 黃永年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第二章『關隴集團始末』，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第五七頁。

形、異形等)與紋飾圖案(四神、十二辰及花草紋樣等),同樣可以對隋代與其前朝後世的遞承情狀作文化藝術之考察。總之,憑藉彙考集成起來的資料平臺,應能有效推進隋代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並將隨著對新資料與新問題的研討進而為新理論的構建鋪墊坦途。

三

自宋迄今,致力於金石文字之蒐羅與研究者代不乏人,金石著述亦包羅萬象、與時俱增。『但由於各家重視角度不同,而有偏廢,殊少全面顧及』,故毛漢光先生早在編纂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時強調:『站在拓展史料立場,片言只字都是寶貴的,因此,不論碑主是否有名,字體是否特殊,辭句是否優雅,皆應視為重要史料,盡量設法保存。』^①彙考即效法了這樣的原則,更不論文字或多或少或寡、拓本或完或殘、質地或石或磚,乃至或碑形、或墨書之等等情狀,舉凡誌墓性質之人物誌皆予收錄,以盡可能地將史料求全留真。惟其如此,乃略能彌補岑仲勉先生四十年前喟歎『近世隋唐石刻,發見極多,唯其多故難於集中,不克大量利用以補充史傳之弗足,是又別一可惜之事也』的遺憾。^②

彙考所蒐隋代墓誌銘之體量迄有六四三種(包括存疑、買地券、存目諸類),此外又有將另行編纂的塔誌銘五四種(含存目一九種)和與隋並行時期之高昌國磚墓表九二種,則隋代墓銘類遺存總數已達七八九種。以此數目與岑仲勉先生隋代石刻(磚附)目錄初輯所得相較,四十年後真何啻倍蓰。謹羅舉近世幾種金石書籍所收隋誌數量比照之:

① 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總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一,一九八三年版第二頁。

② 隋書州郡牧守編年表一九五七年重修再序,隋書求是,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版第一三六頁。

書名	隋誌數目	備注
寰宇訪碑錄、補錄、續補、再續	七一	含塔銘、塔記、磚誌
古誌彙目	一一二	含塔銘、塔記、磚誌
墓誌徵存目錄	二一四	含塔銘、塔記、磚誌
石刻名彙	二一七	含塔銘、塔記、磚誌
隋代石刻目錄初輯	二九六	含塔銘、塔記、磚誌與高昌墓表
六朝墓誌檢要(含存目)	三〇一	含塔銘、磚誌，無塔記與高昌墓表
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均有圖版)	二二九	含塔銘、塔記、磚誌，無高昌墓表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均有圖版)	二二八	含塔銘、塔記、磚誌，不計高昌墓表
隋唐五代墓誌彙編(均有圖版)	二九八	含塔銘、塔記、磚誌，不計高昌墓表
隋代墓誌銘彙考(附存目)	六四三	不含塔銘、塔記與高昌墓表

由上表之統計數據，作為編者不禁每每感慨：地不愛寶，待我獨厚，彙考之作，幸得其時。

葉昌熾在《語石卷二》「總論各省石刻」一則講道：『關中為漢唐舊都，古碑淵藪。其次則直隸、河南、山東、山西。』以因地而求的辦法來檢查本書所收六四三種隋代墓誌銘的出土地域分佈狀況，計有河南二八五種、陝西一五七種(含存疑二種)、河北六四種、山東二七種、山西二七種、甘肅七種(含存疑一種)、安徽六種、江蘇三種、廣東三種、北京二種、遼寧二種、浙江二種、寧夏二種、湖北一種、四川一種、內蒙古一種、湖南一種(買地券)、不能確知出土地者五四種(含存疑一種)，另有新疆九二種(均為高昌國時期磚墓誌)。可見隋誌出土密集地域猶在河南、陝西、河北、山東、山西。